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伊斯兰国”是如何兴起的

□ 徐 娟 金 瑞

自2014年6月以来，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攻城略地，迅速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该组织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宣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逊尼派伊斯兰政权，并为此制定了建国纲领。事实上，“伊斯兰国”已经在按照国家治理模式运转，在其占领区设立行政机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独立的财政管理体系，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其发展态势已远远超出外界预期，到目前为止，有核心武装人员三万人，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在其控制的地盘上约有人口四百万。2015年5月，占领了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百多公里的拉马迪。

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不仅改变了中东原有政治版图，也在牵动世界神经。本想撤军的美国面对脱离剧本设计的中东，不得不“重返中东”，地区大国间对抗日益尖锐，早已是一团乱麻的中东教派纷争日趋激烈，新一波地区恐怖活动浪潮正在形成，“伊斯兰国”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生态变迁的一个节点。而它并非一天造就，其缘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历经长时间的积累和重大事件的催化。

长期因素：地缘政治复杂、文化霸权压制和国家认同缺失

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和社会变迁与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紧密相连。中东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扼守世界三洲五洋的交通枢纽，是“世界油库”，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发源地，这三个独一无二决定了中东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也正是中东的世界地缘要冲价值，使中东经历长久的太平盛世之后陷入无尽的战争和动荡中。当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的炮火硝烟中土崩瓦解，西方社会迅速填补了政治真空，从此伊斯兰世界就完全处于西方社会的控制下，中东成为英、法、西、美等国的托管地或殖民地。中东国家几易其主，台前幕后都是大国的影子，中东的事务从来就不是由中东自行决定，这里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新角色不断更替，而每一次更替必然带来更加激烈的地区动荡。今天中东的政治版图是殖民者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依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的，这个以经纬度划出的中东政治版图是对民族、宗教、历史的无理切割。一方面，众多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民族被分割到不同国家，形成跨界民族和边界地区多民族杂居现象，如将库尔德人分别划给了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四个国家；另一方面，这种殖民分割造成中东民族国家的建构存在天然缺陷，政治发展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如将奥斯曼帝国中的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三个省捏合成今天的伊拉克，强迫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生活在一个国度，而“伊斯兰国”正是利用边境划分的不合理，要把被切割的杂乱无章的国界按照历史重新整合，将分别划入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等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统一起来。任意划分的国界引起后来许多中东国家在水资源、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布的纠纷与摩擦，以及民族归属、领土争端、边界冲突等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状况在二战和冷战中被固化成型，直接导致当代中东地缘政治塑造严重滞后，并陷入恶性循环，相关国家内部政局起伏跌宕、国家间流血冲突此起彼伏、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和平成为梦想。

中期因素：美国反恐战争和中东“民主化”改造

毫无疑问，“9·11”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国际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许多恐怖组织受到重创甚至销声匿迹。但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一结束，中东恐怖主义开始迅速反弹，伊拉克及周边地区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分析“伊斯兰国”的发展脉络能够清晰看出伊拉克战争是其扩充成员的助推剂。而战后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政策激化了原本就盘根错节的矛盾。一方面，伊拉克内部的派别纷争、对立和冲突日益尖锐。历史上，伊拉克是一个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但却是逊尼派长期掌握国家政权。战后，美国推翻了逊尼派强权萨达姆，推行美式民主，搞一人一票选举，什叶派将人口优势转化成权力优势，摆脱枷锁的什叶派对逊尼派一直采取打击报复政策，逊尼派完全被排除在伊拉克的政治进程之外。宁愿战死也不愿接受战后秩序的逊尼派在其聚集区不断发展反美反政府武装，使得包括“伊斯兰国”前身约旦人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在内的极端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伊拉克战争刺激了民众的伊斯兰教理念，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蔓延，美式民主将伊拉克打造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相互厮杀的屠宰场。另一方面，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态势。战前，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基本维持中东的政治生态平衡，但战后不堪一击的平衡被打破。在中东，伊拉克是制衡伊朗的地区力量，而按照美国方式选举出的政权与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握手言和，没有了长期的对手，这对伊朗而言无疑如释重负，伊朗所主导的从波斯湾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什叶派新月地带”悄然成形。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美国的政策设计，结果也着实让美国尴尬：美国轻而易举地端掉塔利班、拿下伊拉克、灭掉萨达姆，却发现伊朗在中东的地缘位置凸显，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扶摇直上。以沙特为代表的大多数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开始坐卧不安，这为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教派的对抗日益成为中东地区的新态势，教派冲突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更让美国头疼的是，美国本想把伊拉克打造成中东的民主样板，结果在之前的高压统治下被遮盖的教派冲突、民族矛盾、地区失衡等问题却因伊拉克战争得到彻底释放，伊拉克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伊拉克民众乃至阿拉伯世界同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的对立公开化。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在伊拉克明显水土不服，西方民主的强行植入并未奏效，还把一个伊斯兰教世俗国家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地方。美国忽视了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化的中东同西方文化氛围中的美国在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始终崇尚政教合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及其运作都一以贯之地统一于伊斯兰教的历史框架内，宗教神学干预世俗政权在历经沧桑后仍坚如磐石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形成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的政治文化结构。而且迄今为止，美国对中东输出的民主几乎都属于民主形式的东西，缺乏内涵基础或内涵完全不符的形式民主注定是会是变形的或短命的。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社会问题严重、贫富悬殊、腐败成风使民主在中东难有基础，民众反而更愿意加入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行列去寻求社会公正。

近期因素：美国“战略再平衡”和中东政治动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战略收缩，从中东尽快脱身，特别在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加快了“亚太再平衡”的步伐。2011年从伊拉克全面撤军，缩小了反恐的范围，降低了反恐的烈度，美国的这一政策造成该地区某种意义上的安全空白，恐怖主义乘虚而入。而在此之前，“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被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元气大伤，多名高官被杀，扎卡维也被击毙，2011年该组织已不足千人。美国战略收缩过犹不及，不仅使恐怖组织的压力骤减，为基地组织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而且使伊拉克再次走回危机阴影。美国在打碎了伊拉克原有国家机器的同时，却没能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新体制，又不负责任地把破罐子甩给了马利基政府，马利基政府执政不力，教派冲突全面升级。

紧接着，中东地区爆发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席卷多国的历史性大变局，专制强人纷纷走下历史舞台，中东政治变迁如过山车一般令人应接不暇。从内部来看，总结20世纪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的规律：政治变迁必然带来政治伊斯兰势力走进权力斗争中心，在新政权确立之前，层出不穷的政治反对力量往往会借助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国家政治进程。此轮强人政权的终结使中东国家面临发展道路的抉择，各派势力为主导国家政治进程较量白热化，宗教极端势力粉墨登场，宗教政治运动抬头，为伊斯兰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外部来讲，功利主义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空前发展，却忽视了人文发展，人的内心精神追求被抑制和漠视，这不可避免造成精神空虚、缺乏自省的信仰危机，于是便有了西方部分中产阶级放下舒适的生活而加入“伊斯兰国”。由于“伊斯兰国”加入便利、手法隐蔽、宣传有效吸引了欧美“圣战”分子主动搜寻入伙机会，这促使“伊斯兰国”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将动乱祸水引向叙利亚、伊朗等国，加大了对变局的干涉力度，多国强人的垮台使教派纷争沿着脆弱的边界在中东地区蔓延，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加速崩溃。尤其是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加快了“伊斯兰国”的孵化进度，可以说，“伊斯兰国”出现在伊拉克，迅速崛起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的两国逊尼派聚集区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迅速扩张，其奉行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策得到了西方国家和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默许，并得到大量资助，使其在叙利亚战场上初具规模，不得不说“伊斯兰国”走到今天是西方国家和部分中东国家选择性“失明”的结果。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历来奉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惯用“借力打力”扮演“隔岸平衡手”角色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美国总是在寻求新的制衡筹码，此次又试图借用“伊斯兰国”之手削弱伊朗和叙利亚，恰到好处打击自己的对手以保持地区优势，结果却事与愿违。随着扩张加速，“伊斯兰国”的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早已超出美国的利益底线。因此，“伊斯兰国”的崛起固然是阿拉伯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更是大国博弈特别是美国中东政策造成的直接恶果。

奥马尔之死与阿富汗变局

□ 王 琦

自2001年12月骑着摩托车逃往坎大哈后，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这位被称为“信徒的领袖”的塔利班前最高领导人便再未公开露面。过去十几载，他每年只发表两次公开声明，一次是在斋月之后的开斋节，另一次是在麦加朝圣后的宰牲节。这些声明被视作是塔利班组织最权威的政策发布。2015年7月17日，开斋节前夕，以奥马尔名义发表的最后一份声明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塔利班最高领袖14年来首次公开表示愿与政府对话。

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政府的首轮正式会谈于7月7日在巴基斯坦举行，双方原定于7月3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第二轮对话，但7月29日，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宣称奥马尔于2013年4月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卡拉奇的一所医院“可疑地死去”。一天后，塔利班确认其最高领袖“因病去世”。那么，既然奥马尔两年前已死，谁在代表塔利班与政府谈判，他们受谁控制呢？

去年3月，阿富汗总统加尼在访问美国时说：“阿富汗和解进程的最根本问题，不是与塔利班言和，而是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的问题。”一段时间里，阿富汗指责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为其提供资金与保护。前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道得扎伊也指出，巴基斯坦称他们控制不了塔利班，这话得这样理解：有些痛恨你的塔利班当然无法控制；有些虽然不信任你，你却可以施加影响；有些却实实在在受制于你。安排一些你掌控的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会谈，这就是巴基斯坦在2015年7月所做的。

基于阿富汗社会对巴基斯坦长期而严重的不信任，加尼总统将改善双边关系作为外交工作重点。2014年9月履新后，他率先访问沙特和中国，两个对巴基斯坦影响最大的国家，并取得中方对于“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和解进程的支持。访华两周后，加尼到访巴基斯坦，并在会晤巴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时明确提出，“是时候结束两国间13年来所谓‘未宣战的战争’了”。加尼此行还做出一系列“破冰”承诺，诸如收回其前任提出的从印度引进重型武器的要求，提议两国军方和情报机构进行更为透明和紧密的合作等等。

不过，形势并未向加尼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塔利班为和谈设置多个前提，包括承认其设在卡塔尔多哈的政治办公室的合法性，美国将其从“正义赏金项目”中移除等等。另一方面，自2015年4月24日，塔利班宣布发动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以来，其在全国多个省份与政府军展开激战，规模为近年之最。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公开表示，加尼与巴基斯坦就情报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对阿富汗人民的背板”。

迫于各方压力，2015年7月7日，奥马尔的副手、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的毛拉·曼苏尔派出多位高层与阿富汗政府和谈，东道主巴基斯坦主持会议，中国、美国代表列席。尽管这被外界视作是阿富汗和平进程的一大突破，但实际上却加速了塔利班的分裂。事后，塔利班多哈政府办公室发言人将此次谈判代表称为“巴基斯坦的人质”。7月9日，塔利班网站刊出一篇文章，但4小时后便遭删除，其中写道：这次备受瞩目的和谈，不过是一些塔利班成员代巴基斯坦宣扬其主张而已。上述表态被视作塔利班内部矛盾的公开化。

近年来，以前军事领袖扎希尔为代表的数位塔利班领导人频频对曼苏尔代奥马尔发号施令一事提出质疑。2015年7月1日，曾长期视奥马尔为其领袖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发表声明，称因确信奥马尔已死，其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7月23日，塔利班一分支组织Fidai Mahaz在社交网站上称奥马尔于2013年被曼苏尔和塔利班财政首领伊沙克扎伊共同杀害。紧接着阿富汗媒体爆出，塔利班高级领导机构奎达舒拉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要求曼苏尔带他们的代表面见奥马尔，以确认后者的生死。

7月30日，塔利班确认奥马尔死亡。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原定于7月3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第二轮阿富汗和平对话被推迟。7月31日，塔利班宣布曼苏尔为该组织新领导人。

曼苏尔上台后，阿富汗安全局势再度恶化。8月7日，喀布尔一天内三次遭袭，总共造成51人死亡，阿富汗首都经历了自2011年以来最血腥的一天。事后加尼总统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对其境内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及军火黑工厂的听之任之，是导致阿富汗境内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9月28日，阿北部重镇昆都士市被塔利班攻占，这是后者2001年以来首次攻占省会城市。尽管在美军支持下，阿安全部队3天后夺回昆都士，但该事件对阿富汗局势产生多重影响。

首先，塔利班武装对昆都士市的猛攻，以及其在与昆都士省相邻的巴达赫尚省、塔哈尔省、巴格兰省发动的攻势，说明塔利班的进攻策略已发生重大调整，其在巩固阿南部根据地的同时，正不断向阿东北部、北部渗透，并且有从农村向城市进军的势头。同时，由于新领导人曼苏尔短期内无法服众，为稳固地位，团结队伍，避免更大规模的分裂，曼苏尔有可能借助袭击和军事进攻在塔利班内部扬威立万，并努力将各派的注意力引导到战场上。其次，2015年4月以来，塔利班在阿东部多个省份与加速渗透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形成对攻。塔利班在昆都士市的短暂胜利，也有向“伊斯兰国”示威和宣示存在感之意。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的竞争，使得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再次，自2015年初全面接手本土防务以来，阿富汗政府军频遭塔利班袭击，伤亡人数较往年明显上升。去年前7个月，共有4300多名安全部队成员在与塔利班的战斗中阵亡。这不仅严重打击了阿安全部队的士气，也令上任将满一年，曾数度强调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阿富汗总统加尼渐失民心。最后，迫于塔利班的反扑、“伊斯兰国”的渗透和基地组织的回潮，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10月15日宣布，再度放缓从阿富汗撤军计划，将在2016年后在阿富汗驻留5500名美军士兵。而2015年3月，奥巴马曾宣布放缓驻阿美军撤军步伐，维持现有9800人的驻军规模至今年年底。

不过，武力只能威慑和压制，对于塔利班这种在阿富汗经营多年，拥有一定民意基础的武装组织而言，和谈仍是必然选择。

对中国而言，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是“中巴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应支持阿富汗的民族团结政府有效施政，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支持阿富汗的经济社会重建，支持阿富汗融入地区合作，中方应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加强沟通和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为阿富汗实现顺利转型不懈努力。

环球瞭望

西方社会

美国为何“控枪难”

□ 陈积敏

2015年12月2日，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内陆地区服务中心枪击案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伤，这是美国去年发生的致死人数最多的大规模枪击案。女枪手马利克（Tashfeen Malik）曾在使用别名的脸书账号中发文，对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宣誓效忠，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案件作为恐怖袭击行为来处理。

该起案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两大问题的讨论，即防范美国本土恐怖主义行为与控枪政策。12月5日，奥巴马总统在“每周讲话”（Weekly Address）中表示，枪手使用了用于战争的进攻性武器，并称“这又是一个悲剧性的警醒：危险人物太容易在美国拥有枪支了”，再次呼吁国会采取措施加强枪支管理。美国主流舆论也支持政府控枪政策，如《纽约时报》12月4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枪支流行疫》（The Gun Epidemic）的社论，称“民众可以合法购买专门用来以残暴速度与效率杀人的武器，这是一种道德暴行与国家耻辱”，强烈要求美国社会积极行动起来终止枪支暴力。这是该报自1920年以来首次在第一版面发表社论，表明了其坚决性以及控枪的紧迫性。不仅如此，社会大众也对控枪政策表示了认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7月份发布的民调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强化枪支管理与加强对购枪者的安全背景调查，其中79%受访者认为应禁止那些有精神问题的人购买枪支，70%的人支持建立联邦枪支售卖数据库，57%的人主张禁止出售进攻性武器。

然而，奥巴马政府的控枪努力却收效甚微。12月3日即枪击案发生第二天，参议院审议了几项控枪方案，如对购枪者进行延伸背景调查以及禁止在恐怖主义监视名单和禁飞名单（no-fly list）上的人购买枪支等，但未获通过。美国控枪政策为何如此难以推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拥枪是一项宪法权利。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纪律严明之民兵乃保障自由州安全之所需，人民保有及配带武器之权不得侵犯。”这就为公民合法拥枪提供了最根本法律基础。2008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赫勒诉哥伦比亚特区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的判决，再次确认了公民个人的拥枪权利。因此，在12月3日审议控枪法案时，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考宁（John Cornyn）就指出：“这是非美国式的做法。它违反了赋予所有美国人的核心宪法保护（精神）。”

二是拥枪是一项历史传统。美国人有拥枪的传统，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当时美国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公民必须拥枪才能抵御外来攻击。另外，当时很多美国人以打猎为生，武器成为了一种生活必需品。后来，美国人虽然不再以打猎为生，但却将其作为了一项休闲活动，枪支自然也就融入到美国生活当中。拥枪既然是一种传统，已经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要改变它就会非常困难。尽管美国民众对于政府加强枪支管理予以支持，但要是禁止民众拥枪则是犯了众怒。10月7—11日盖洛普（Galiop）的民调就说明了这一点，72%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禁止民众的拥枪权利，持赞成态度的仅为27%。实际上，在当前恐怖袭击频发时期，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拥枪也是一种基本的安全保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科鲁兹（Ted Cruz）在爱荷华州宣称“用我们的枪来对付坏蛋”，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不少美国人的心声。每次在发生重大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人就会掀起一股购枪高潮。某种意义上来说，枪击案与拥枪自保已形成了一种循环。

三是利益集团政治的强大阻力。军工利益集团（如美国来复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非同寻常，这早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就已露出端倪。因此，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前就警告称要防范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治的绑架。2014年中期选举时，“美国来复枪协会”共资助国会议员候选人120亿美元，其中95%受资助对象成功当选。这批人显然成为了它们在政府的利益代言人。此外，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现象在控枪政策上也有明显体现。目前，民主党人主张对枪支实行更严格管理，如禁止罪犯和容易情绪不稳定的人持有枪支、禁止向公民个人出售进攻性武器等等。但是，共和党人则突出强调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在2015年12月3日的参议院投票中，绝大多数（近93%）共和党人参议员反对民主党所提出的控枪方案，其中身为参议员的四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全部投反对票。可见，在这样的政治现状下，美国控枪政策很难取得实质性推进。

四是联邦体制难以形成控枪合力。美国各州对于枪支管理的力度不一样，例如加州对于枪支管理相对比较严格，禁止向民众出售大容量的弹药夹和军用攻击型步枪；对购枪者进行严格的身份登记与安全审查等。但是，那些希望拥枪的人可以到邻近的管理较为宽松的州去购买，然后再带回加州。可见，美国要想在控枪问题上有所进展，除了政府大力推动之外，国会要相互支持，民众要形成基本共识，各州与地方政府要同步运作。然而，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